地方文献所见乡村地名之历史书写与流变*

——以“苗锾”“苗光”为中心的探讨

李鹏飞

提　要：受史料限制，很多情况下我们对区域小地名的历史演变缺乏深入探讨，甚至大多停留在口头传说之中。而近年来清水江流域契约文书、碑刻等民间文献的发掘与利用为这种精细化研究提供了诸多可能，研究结论亦能与地方志互证，补已有记载之不足，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对“苗锾”“苗光”两个典型的乡村地名之流变情况的梳理与考证，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在民间文献与地方志中的记载有很大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孰是孰非，值得探究。其背后则隐藏着民族地区乡村地名变迁的复杂缘由，“音转字变”与民族融合都可能是原因之一。

关键词：地方文献　地名　流变　苗锾　苗光

近 50 年来，贵州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涌现出大量契约文书、碑刻、族谱等民间文献。有鉴于此，地名相关研究亦取得一定成绩，但这些成果多从语言学、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展开，缺乏文献资料的考证。① 仅就契约文书而言，清水江文书中的“地名”主要有两种，一是标的物坐落地之名，另一种便是“贯”。有时“贯”虽指同一地，但其书写样式可谓千变万化，有的多达 22 种，反映了历史上民族地名书写之乱象，其间存在着“音转字变”② 的情况。清水江文书征集

---

*　本文为 2018 年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清水江文书所见地名研究”（项目编号：2018jd143）阶段性成果。

① 李一如《清水江中下游苗族契约中苗汉语互借机制研究》（《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认为苗族契约中存在丰富的苗汉语互借的文字记载，尤其是“汉字记苗音”地名的苗汉语互借现象非常突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整理中的苗侗语地名考释刍议》（《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 年第 2 期）发现锦屏文书中的苗侗语地名记录和反映了这一地区自然、政治、经济、民族等方面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因受汉文化影响程度的不同，诸文书中对地名的翻译和书写与真实地名的音义存在有一定差异。李艳《从地名的含义看清水江苗族杉木林区文化与生态的互动》（《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从加池寨部分地名的解读入手，从文化与生态互动的视角论述了该村地名的含义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对所处自然生态系统加工改造和利用，是双向互动的结果。杨庭硕、朱晴晴《清水江林契中所见汉字译写苗语地名的解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认为清水江文书中地名多用苗语标识，书写时又用汉字译写，缺乏统一和规范，非常不利于清水江文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章以锦屏县河口乡加池村林契为研究对象，运用语言学手段从多个方面对林契所见汉字译写苗语地名现象进行了解读，探求其规律。此外，拙著《清水江文书之地名学价值探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 年第 4 期）认为清水江文书中潜藏着十分丰富的地名资源，作为一种新材料，清水江文书在探寻地名之历史流变及历史地名之考证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和价值。而本文即为这一观点之发明。

② 据吴泽顺研究，“音转”是指词语由于历史的（同源分化）、地域的（方言差异）以及文字使用上的（音近假借、一词多形）种种原因而产生的语音流转现象。这种语音流转，往往伴生着词形或词义的变化（吴泽顺：《汉语音转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此外，据孙雍长研究，不同地域或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使用同一语词来表达某一相同意义时，其语言有可能呈现出具有一定规律的变异。这种意义不变而语音有所变易的现象，可称之为“音转义存”，简称“音转”或“声转”（孙雍长：《训诂原理》，语文出版社，1997 年）。

地为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地名的得名与变迁都或与民族融合有关，这在府志、县志、地名志等官方材料中均能找到印证。因此，从汉文化的视角，官方资料多把一些所谓的涉民族歧视地名雅化，以有利于民族团结。其实，这只是陷入了泛民族歧视的误区，也使得地名所包含的原始文化信息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给地名解读带来不少困难。为此，本文运用文献互证的方法，通过对“苗馁”“苗光”这两个地名之历史流变的梳理、考证与研究，揭示出民族地区乡村地名之流变存着“音转字变”与民族融合两大缘由。

一 “苗馁”之历史书写与流变

“苗馁”，古苗语称“dliangbniel”，是现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韶霭”村的旧称。“苗馁”与文斗及后面要论述的“苗光”等寨，均为清水江边较古老的村寨。① 有人说“苗馁”是古苗语“苗寨之母”② 的意思。也有人说“苗馁”苗语称“shēi niě”，意为“住在半坡出产鲤鱼的寨子”③。《贵州省锦屏县地名志》中亦有“该村原名苗累，以居住苗族得名”④ 的说法。很显然，“苗馁”属于民族地名，仅从字面上去解释其得名缘由就会陷入误区。当然，受资料限制，我们也无法对这一问题做过多探讨，但从“苗馁”到“韶霭”的历史流变我们却可以从地方文献中找到线索。

在乾隆《开泰县志》中，舆图有“苗光寨”“苗馁塘”；《武备志》有“苗光塘”“苗馁塘”；《田赋志》有“苗光四两”“苗馁一两三钱四分”⑤。

据道光《黎平府志》载：“雍正七年，招抚苗光十一寨”，其中“苗光寨，城北一百二十里……苗馁寨，城北一百二十里。”⑥ “雍正七年，招抚苗光十一寨苗民，自认苗赋银……苗光四两……苗馁一两三钱四分……每年应买下江兵粮……上下苗光买谷六十石……苗馁买谷二十三石……”⑦ 王寨汛把总所属七塘，其中有“苗光塘，城东北一百五十里”。龙里汛外委所属四塘，其中有“苗馁塘，城北一百一十五里”⑧。“（康熙）三十三年八月，清水江韩世儒、米元魁等作乱，官兵往戡之，贼遁走。冬，知府宋敏学、副将罗淇请巡边以弭奸匪，于是平鳌、文斗、苗光、苗馁等寨生苗皆纳粮附籍。”⑨

同样，光绪《黎平府志》亦有相似记载：“雍正七年招抚瑶光十一寨”，其中，“韶霭寨，城北一百一十里，原名苗馁，知府胡林翼更今名”。“雍正七年招抚瑶光十一寨苗民，自认苗赋银一十七两七钱七分，同屯粮起解。分注：瑶光四两……苗馁一两三钱四分。”“每年应买下江兵粮米二十八石三斗……上下瑶光买谷六十石，米八石四斗九升……苗馁买谷二十三石米三石二斗

① 参见锦屏县地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志：1991—2009》（上册），方志出版社，2011 年，第 213 页。
② 杨秀廷：《缱绻与伤怀》，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 年，第 91 页。
③ 王宗勋：《寻拾遗落的记忆锦屏文书征集手记》，世界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5 年，第 70 页。
④ 锦屏县人民政府编：《贵州省锦屏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7 年，第 205 页。
⑤ 参见郝大成修，王师泰等纂：乾隆《开泰县志》春部《舆图》《武备》，夏部《田赋》，“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巴蜀书社，2006 年，第 19 册，第 8、30、34 页。
⑥ 刘宇昌、杨书魁总修：道光《黎平府志》卷 4《城乡》，方志出版社，2014 年点校本，第 298 页。
⑦ 刘宇昌、杨书魁总修：道光《黎平府志》卷 8《田赋》，第 370 页。
⑧ 刘宇昌、杨书魁总修：道光《黎平府志》卷 36《兵制》，第 869 页。
⑨ 刘宇昌、杨书魁总修：道光《黎平府志》卷 37《师旅》，第 895 页。

五升四合五勺。”① “康熙三十三年，平清水江韩世儒等之乱，淇与知府宋敏学请巡边以戢奸匪，于是平鳌、文斗、苗光、苗铗等寨皆纳粮附籍。”②

此外，笔者还找到部分相关材料，摘录如下：

1. 岑梧九迫坡荒山卖契：

立卖山坡芳平，苗铗寨杨香保、笼保弟兄二人……请中问到庙吾寨现宇、现乡名下承买开坎管业……今欲有凭，立此断卖契，永远子孙存照……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十六日立卖。③

2. 乾隆五十五年（1790）瑶光、裕和白岩塘分析合同：

大塘以下山塘苗光管业……中等劝归苗光、苗吼两寨公管……中证：苗铗李宗枝。④

3. 咸丰元年（1851）《拟定江规款示》碑。由于碑文较长，且碑文与本文关系不大，故省去不录。本文关注的重点是碑文中有“苗光”，结尾刻有“苗铗”字样。⑤

4. 光绪二年（1876）《彦洞记述》碑：

……逆苗彼害不成，此害又生。于同治元年勾结教匪姜映芳，盘踞汉寨，一名呼为九龙山……所慕附近苗光，苗光自顾不出……韶霭李国梁协同我寨团首罗天德、王成福、杨占魁等，同恳黎平府主袁施帮口粮，于八月初五日仗宪兵威，一鼓克服……⑥

5. 姜海闻《三营记》稿：

光绪十二年四月，府主郭印恒札探办各处殉难尽节，缮入昭忠祠，三营皆将阵亡人等录报。……又将各寨团首人名开陈于后：瑶光寨：姜吉瑞（文魁）、姜大礼（附生）……韶霭寨：李国梁、龙家琼……⑦

根据以上材料，可以把“苗铗”之历史流变梳理一番：“苗铗”之名可追溯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从康熙至乾隆，其名称不变，甚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修的《黎平府志》亦写作“苗铗”。而在资料3、4、5中，“苗铗”之名已逐渐变成“韶霭”。还有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光绪《黎平府志》中记有胡林翼更“苗铗”为“韶霭”一说。此后，“韶霭”一名延用至今。

---

① 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卷2《地理志·城池》、卷3《食货志·赋税》，“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7册，第103、199页。

② 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卷6《秩官志·宦绩》，“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8册，第49页。

③ 锦屏县地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志：1991—2009》（下册），第1267—1268页。

④ 锦屏县地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志：1991—2009》（下册），第1281—1282页。

⑤ 参见刘毓荣主编：《锦屏县林业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9页；另见河口乡瑶光村村民委员会编：《瑶光志》（内部资料），2010年，第266—267页。

⑥ 姚炽昌选辑点校：《锦屏碑文选辑》（内部资料），1997年，第5页。

⑦ 锦屏县地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志：1991—2009》（下册），第1556页。

表 1 契约文书所见“苗馁”之历史流变

资料来源	出处	地名	时间	出处	地名	时间
清水江文书 1－3 辑	3. 10. 384	苗馁寨	乾隆二十三年	1. 3. 61	韶霭寨	道光七年
	1. 8. 5	苗馁寨	乾隆四十三年	1. 3. 357	韶霭寨	道光七年
	1. 8. 6	苗馁寨	乾隆四十三年	3. 10. 236	苗馁寨	道光八年
	1. 8. 14	苗馁寨	乾隆四十七年	3. 10. 240	苗馁寨	道光十一年
	1. 3. 8	苗馁寨	乾隆五十九年	1. 8. 49	韶霭寨	道光十三年
	1. 3. 313	苗馁寨	嘉庆三年六月十一日	1. 3. 79	韶霭	道光十五年
	1. 7. 21	苗馁	嘉庆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1. 12. 80	韶藹寨	道光十五年
	1. 7. 156	韶藹寨	嘉庆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 13. 110	苗馁寨	道光十六年
	1. 7. 24	韶藹寨	嘉庆八年	1. 3. 349	韶霭寨	道光十九年
	1. 8. 29	苗馁寨	嘉庆十三年	1. 8. 59	韶霭寨	道光二十一年
	1. 7. 28	韶霭寨	嘉庆十五年	1. 8. 64	苗馁寨	咸丰四年
	1. 5. 336	苗馁寨	嘉庆十六年	2. 2. 213	韶霭	咸丰六年
	1. 7. 189	韶藹寨	嘉庆二十五年	1. 7. 220	苗馁寨	咸丰十一年
	3. 10. 235	苗馁寨	道光三年	3. 10. 551	苗馁寨	民国十年
	1. 4. 41	韶霭寨	道光四年	1. 5. 150	韶霭	民国三十七年
	1. 4. 313	韶霭寨	道光四年			
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 1－4 卷	1. 120	韶霭村	嘉庆十九年			

说明：在《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中共找到 7 份，有 6 份与《清水江文书》相同，故省去不录。此外，为精简表格，又能保留文献资料的具体出处，这里采用 X（辑）. X（册或卷）. X（页码）的形式标注，如表中的 3. 10. 384 是指《清水江文书》第 3 辑第 10 册第 384 页；1. 120 是指《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第 1 卷第 120 页。下同，不再详注

但是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呢？从《胡林翼年谱》和光绪《黎平府志》相关记载来看，胡林翼担任黎平知府始于咸丰元年，是年六月，胡“卸思南府事，补授黎平知府”。但很快到咸丰二年（1852）十月，胡便“卸黎平府事”，咸丰四年胡又升任贵东道。① 实际上，咸丰二年十月以后，胡的活动轨迹或主要精力基本不在黎平府，而是在周边平息叛乱。如果“韶霭”确为胡林翼所改，那时间点的最大区间应该在咸丰元年至咸丰二年，即 1851—1852 年，恰好在

① 参见严树森编，湘农点读：《胡林翼年谱》，大陆书局，1933 年，第 20—24 页。

道光《黎平府志》与光绪《黎平府志》修撰之间。这样一来，胡林翼更名说就看似很正确，也有官方史料支撑，但如果梳理下新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我们便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从表1及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康熙、乾隆时期“苗铗”的名称没有发生变化，但到嘉庆时期就开始有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嘉庆三年（1798）与嘉庆四年，可谓是一个分水岭，出现从“苗铗”向“韶霭”的转变。嘉庆三年六月十一日、九二十八日有两份契约文书中还写作“苗铗”，但到了嘉庆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另一份契约文书中就变成“韶藹”了。嘉庆四年以后以“韶霭”为主，间有“苗铗”出现。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光绪《黎平府志》所载胡林翼改“苗铗”为“韶霭”的说法与史实不符，最主要的是与清水江文书所见历史信息不符。“苗铗”的更名时间至少可向前推至嘉庆三年与嘉庆四年之间，即1798—1799年。

其实，民间关于“苗铗”的更名时间及缘由还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清代中期，一位游学行迹至此，以为“苗铗”一名欠雅，清晨登上村后高处，但见阳光初照，霞彩绚丽，薄雾霭霭，村寨一派祥和，不禁脱口而出：“红日东出尽彩霞，雾霭散现苗人家。真不愧为‘韶霭’也!”后人遂将村名改为今名。①

想必这种说法也非空穴来风，在《印象锦屏》里同样有这么一段：

> 据说在清朝中期，一位来韶霭云游做客的湖南名士赖先生写下这样的诗句：“红日东出尽彩霞，雾霭散现苗人家”，并连声称赞：“韶霭，真不愧为韶霭也。”自此，韶霭这个内藏金光的美丽的苗寨名称从那时起一直延用至今。②

从这些传说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韶霭”的得名时间为清代中期，得名缘由是“韶霭”独特的自然景观，得名于湖南名士“赖先生”或“一位游学”，甚至是“一道长”。至于这个“赖先生”“游学”“道长”为何许人，已无从考证。这里也只是摘录存疑，仅供参考。但这些传说故事，却隐隐约约地向我们传递着一些信息。即“苗铗”一名因“欠雅”而更，因自然景观而得名“韶霭”，反映了民间对“韶霭”得名缘由的一种历史想象，但还是带有一定民族歧视色彩的。

与这些不靠谱的传说故事相比，很多人可能觉得刚被否定的胡林翼更名说更为可信。因为，按照光绪《黎平府志》的记载，胡林翼不仅改了“苗铗”，还改了“苗光”。

二 “苗光”之历史书写与流变

“苗光”原属明代设置的茂广屯，苗语称“dliangbseib”，是“瑶光”的前称。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与平鳌、文斗、苗铗等寨“皆纳粮附籍”。这点也与现存于平鳌寨的《永远碑记》相互印证。③ 由于“苗光”之历史流变即从“苗光”到“瑶光”之变化十分典型，涉及的问题

① 参见韶霭村简介，http：//www. yigecun. com/cityfild/showcun. aspx? id = FC662253837F5366，2017年10月21日。

② 龙涛：《印象锦屏文化旅游散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第121页。

③ 碑文有“黎平府正堂记录八次宋……尔等既归版图，倾心向化，亦朝廷赤子……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示……发平鳌寨晓谕”等字样（王宗勋、杨秀廷点编：《锦屏林业碑文选辑》〈内部资料〉，2005年，第48—49页）。

也比较复杂，除前文已录部分史料外，笔者拟用府志、县志、契约文书、碑刻、村寨志等多种资料进行考述。

据光绪《黎平府志》载：

> 雍正七年招抚瑶光十一寨
>
> 瑶光寨，城北一百二十里，近苗寨，旧名苗光。明为懋广屯附隆里指挥辖。国朝雍正五年改卫设县，七年拨属开泰。为新安苗光九寨，咸丰二年，知府胡林翼度地设碉。面谕：以后公牍文字改写瑶光，不得仍称苗光。①

由此可见，按光绪《黎平府志》的说法，“苗光”也是知府胡林翼所改，且是在咸丰二年，时间点也恰好在道光《黎平府志》与光绪《黎平府志》修撰之间，与“苗铞”类似。难道胡林翼真的改了这两个地名吗？是巧合还是真的如此，让人不禁产生怀疑。

后经笔者再三查找，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首先，如留意前文所录光绪《黎平府志》中“苗铞”应交之赋银及所买之兵粮便会发现，“苗光”已写成“瑶光”，但“苗铞”还是“苗铞”，并没有更名。如果两者皆为胡林翼所改，那应该同时变更才是，而不是一个改了，另一个还没改，这是一大疑点。其次，道光《黎平府志》地理志部分节录了晏斯盛的《黔中水道考》，与其他府县志不同的是，道光《黎平府志》在节录《黔中水道考》的同时，对个别字句进行了修改。其中，清江部分“由此迤南包……而东至县属瑶光、府属茅坪，合亮江小滴水，东至沅埕塘”②，与乾隆《贵州通志》所载“由此迤南包……而东至天柱县界之茅坪，合亮江小滴水，东至沅埕塘”③ 不同。不同之处就是这里出现了“瑶光”，而不是“苗光”，当是有意而为之。不管是道光版，还是光绪版《黎平府志》的前后不一都更加证实了光绪《黎平府志》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道光二十五年（1845）“苗光”已更名为“瑶光”，更名者也绝非胡林翼。

另据《锦屏县志》载：“清雍正时，黎平知府张广泗以瑶光星座改为今名。”④ 这么说“苗光”更名始于张广泗，得名缘由是因“瑶光星座”而命名。“瑶光”为北斗七星的第七星名，在古代象征着祥瑞。张广泗担任黎平知府的时间为清雍正四年至雍正五年，即 1726—1727 年。⑤而这个时候“瑶光十一寨”还没有被招抚，更谈不上改名。即便是张广泗所改，也是招抚之后，但此时张已不是黎平知府，黎平知府张广泗改名说也就不攻自破。至于其寓意是否也真如星名，象征着祥瑞呢，我们不妨加以推演。

有清一代，雍正皇帝是一个非常迷信和崇尚祥瑞文化的君主。从 1722 到 1735 年，雍正仅在位 13 年，但有关祥瑞的记载却数不胜数，达到极致，更有“鄂尔泰奏报‘五色卿云’，竟使云

---

① 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卷 2《地理志·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7 册，第 103 页。

② 刘宇昌、杨书魁总修：道光《黎平府志》卷 3《水道》，第 267—268 页。

③ 鄂尔泰等修，靖道谟、杜诠纂：乾隆《贵州通志》卷 37《艺文考》，“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5 册，第 157 页。

④ 锦屏县地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志：1991—2009》（上册），第 215 页。

⑤ 参见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卷 6《秩官志·武职》，“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7 册。

贵两省官员加爵晋级，奖赏类若平定青海军功”① 的事例。关于鄂尔泰奏报“五色卿云”之事，光绪《黎平府志》亦大篇幅详载。如“（雍正）七年秋，有五色庆云自七月初八日至闰七月十一日凡七现，大有年。所产稻谷、粟米之属自一茎两穗至三四穗不等，稻谷每穗四五百粒，粟米每穗长至尺有奇”②。

从时间上讲，“瑶光”为雍正七年（1729）招抚，“五色卿云”的上奏与记载也在此时。加之，征服“苗疆”可谓是破天荒的大事，而改名的目的是为了安抚“苗光九寨”、维护地方统治，遂把“苗光”改为“瑶光”，取其象征祥瑞也就能解释得通了。改名之后“瑶光”确实比“苗光”好听的多，直至今天我们也会这么想，甚至觉得“苗光”确实有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嫌疑。

因此，“苗光”之改名可能是为了安抚苗民，也可能与祥瑞有关，但还不是很确定。因为笔者在光绪《黎平府志》中还找到了一处名为“瑶光山”的地方，以及瑶光山后五里一株大枫树的传说故事：

> 瑶光山：城北一百四十里，自宝唐蜿蜒而来，到此势甚雄伟，结为大地。下有两江汇合，山后有天池九十九亩，池水四时不竭，常有五色鱼游泳其间。③

> 府属瑶光山后五里，一枫树大数围，枝干盘曲，夭娇如龙。经冬，叶黄如金不凋。春风初拂，一日内即落尽，次日发嫩叶，纯青色。乙卯苗乱，获一苗云：每与我军战，恒见此树下屯兵甚多，戈甲鲜明，遂不敢逼。乡人以为神，岁于三月朔祀之。此树之灵，足庇闾里，固宜祀以报功。语云：草木皆兵，或其验乎。④

此“瑶光山”即为今天的“青山界”⑤ 及其余脉，但在《锦屏县志》中已找不到其身影，只有青山界相关介绍，反而与光绪《黎平府志》所载“瑶光山”相吻合。⑥ 瑶光山后五里的这株大枫树，为瑶光祖先所栽，是瑶光寨的神树。“瑶光”是一个非常崇拜“枫树”的村寨，瑶光人定居于此就是通过倒插枫树进行卜测而确定的。⑦

根据地名命名的一般规则，这里要解释下“瑶光”与“瑶光山”的关系。按光绪《黎平府志》记载，“瑶光”寨位于“瑶光山”后约五里处，如果“瑶光”是因“瑶光山”而得名或改名，那以上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其实，“瑶光”与“瑶光山”还真可能有一定关系。从“苗光”“苗吼”两寨围绕“翁姑

---

① 南炳文、白新良主编，乔治忠撰：《清史纪事本末》第 4 卷《雍正朝》，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200—1209 页。

② 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卷 1《天文志·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7 册，第 40—42 页。

③ 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卷 2《地理志·山水》，“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7 册，第 73 页。

④ 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卷 8《艺文志·杂记》，“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8 册，第 290 页。

⑤ 刘毓荣主编：《锦屏县林业志》，第 58 页。

⑥ 参见锦屏县地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志：1991—2009》（上册），第 50—51 页。

⑦ 参见锦屏县地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志：1991—2009》（下册），第 1234 页。

山”的争讼材料来看，乾隆七年（1742）的《禁垦翁姑山判决书》① 首次提及所争之地“翁姑山”。关于这段史事，有多种版本，2011 年版的《锦屏县志》《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河口乡志》《瑶光志》等均有记载。乾隆五十五年的《苗光、苗吼后龙山所共分地界合同》② 亦有“翁姑（牯）山”之说。后同治（或光绪）五年的一份讼词中有“惟是团等后龙山一带名翁故山，又名为瑶光山”③ 之说。讼词所述之事上可追溯至乾隆七年之《禁垦翁姑山判决书》，“翁故山”当为“翁姑山”，也即是“瑶光山”。这里面就可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翁姑山”改为“瑶光山”，“苗光”也改成“瑶光”；二是“苗光”改为“瑶光”，“翁姑山”也改为“瑶光山”。不管怎样，“苗光”之更名确有其事，更名原因也变得复杂，而不仅仅是为了安抚苗民。

行文至此，“苗光”更名于何时，因何而更名也似乎陷入迷局。胡林翼更名说和张广泗更名说已先后被推翻，但一时也找不到更名的“主”。尤其是“苗光”何时更名为“瑶光”这一重要问题还需进一步考证，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借助于清水江文书、碑刻等民间文献了。

表 2　契约文书所见“苗光”之历史流变

资料来源	出处	地名	时间	出处	地名	时间
清水江文书 1－3 辑	3. 1. 68	苗　光	乾隆二十年	1. 7. 203	瑶光寨	道光十八年
	1. 5. 2	苗　光	乾隆五十五年	1. 7. 204	瑶光寨	道光十八年
	3. 7. 194	瑶光寨	嘉庆六年	1. 2. 246	瑶　光	道光十九年
	3. 7. 196	瑶光寨	嘉庆九年	3. 1. 124	瑶光寨	道光十九年
	1. 7. 189	瑶光寨	嘉庆二十五年	3. 7. 95	瑶光寨	道光二十三年
	3. 1. 89	瑶　光	道光五年	1. 7. 208	瑶　光	道光二十六年
	1. 7. 196	瑶光寨	道光九年	1. 7. 211	瑶　光	道光二十九年
	3. 7. 207	瑶光寨	道光十年	1. 7. 212	瑶　光	道光二十九年
	3. 7. 209	瑶光寨	道光十一年	1. 7. 218	苗光寨	咸丰四年
	3. 1. 167	苗　光	道光十四年	1. 3. 110	瑶　光	光绪八年
	3. 1. 123	瑶光寨	道光十五年			

① 参见锦屏县地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志：1991—2009》（下册），第 1293 页；程泽时：《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90 页；锦屏县河口乡人民政府编：《河口乡志》（内部资料），2010 年，第 530 页；河口乡瑶光村村民委员会编：《瑶光志》，第 266 页。以上所见最大之不同在于前两者无确切时间，后两者有“乾隆七年”之说。后经笔者考证、确认，确为乾隆七年。因为材料中提及“贵州黎平府开泰县正堂加一级军功纪禄三次　方”，这里的方知县即为乾隆七年时任开泰知县的方时宝。参见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卷 6《秩官志·武职》，“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7 册，第 594 页。

② 参见河口乡瑶光村村民委员会编：《瑶光志》（内部资料），第 266—267 页。

③ 据王宗勋考释，此讼词稿约为清光绪中期，参见王宗勋考释：《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卷 4，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 年，第 562—570。但笔者认为，其书写时间当为同治五年或光绪五年。词稿中提及“道光年间”所发生之事，“前县主胡”等历史信息。既然是“道光年间”，那这词稿当写于道光以后，而光绪《黎平府志》所载之开泰县知县，同治二年确有一胡知县，同治五年离职；光绪四年也有一胡知县，光绪五年离职。结合“前县主胡”“去岁”等情，可知这份词稿写于同治五年或光绪五年。参见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卷 6《秩官志·武职》，“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7 册，第 610、613 页。

（续表）

资料来源	出处	地名	时间	出处	地名	时间
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1－4卷	1. 298	苗　光	道光六年	4. 622	苗　光	道光十四年
	4. 612	苗　光	道光十一年	4. 627	苗　光	道光十四年
	4. 621	苗　光	道光十四年	4. 140	瑶　光	道光十九年
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1－3卷				3. 128	苗光寨	嘉庆元年
				2. 177	瑶光寨	道光九年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				73	苗光寨	嘉庆八年
				248	瑶光寨	道光七年
				256	瑶光寨	道光九年

说明：清末以后契约文书中瑶光之写法基本固定，故省去不录

结合表2的统计情况及前文所述，清康乾时期，“苗光”基本是写作“苗光”的。嘉庆时期开始出现“瑶光”。此后基本定型，直至今日。具体而言，嘉庆元年（1796）还有写作“苗光”的，嘉庆六年最早出现“瑶光”的写法。值得注意的是，光绪《黎平府志》里“以后公牍文字改写瑶光，不得仍称苗光”，似乎告诉我们，改名以后，官方文件里是不能看到“苗光”的，都应写作“瑶光”。这在前文提及的乾隆七年《禁垦翁姑山判决书》中有所体现，判词中有“贵州黎平府开泰县正堂加一级军功纪禄三次　方”“茂广屯苗光寨”“苗光”① 等字样，可知此时“苗光”尚未改名。还有一通刊刻了嘉庆七年官方布告的碑文里亦如此。

> 特授贵州黎平府正堂加五级记录十次又军功加五级记录五次程为晓谕事：
> ……杨万金具控瑶光寨娄在奇等……本府正堂查讫瑶光以下……自乾隆四十二年排伕工价定章程：瑶光运至卦治……施行二十余年，相安已久……其在瑶光雇夫运排……为此示，仰瑶光及沿河民苗等知悉……
>
> 嘉庆七年六月初一日示②

从这通碑刻可以看出，与其他材料甚至是写有“苗光”的碑刻资料不同。这份告示全文均写作“瑶光”，甚至乾隆四十二年确定的排伕工价章程里也写作“瑶光”。

此外，康熙五十八年（1719）所立《井碑记》载有“苗光众姓人等”③。乾隆五十五年《苗光、苗吼后龙山所共分地界合同》④ 记有“苗光”。乾隆五十七年（1792）立的《万古碑记》记有“瑶光一寨，离城百四十里许，即茂广屯也”⑤。乾隆五十九年立的《修路碑记》记有“五开

① 河口乡瑶光村村民委员会编：《瑶光志》（内部资料），第266页。
②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侗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③ 河口乡瑶光村村民委员会编：《瑶光志》（内部资料），第238—239页。
④ 参见河口乡瑶光村村民委员会编：《瑶光志》（内部资料），第266—267页。
⑤ 河口乡瑶光村村民委员会编：《瑶光志》（内部资料），第245—246页。

百四十里许，寨名尧光”①。嘉庆十一年（1806）所立《文斗四里塘婚俗改革碑（二）》记有“瑶光寨：姜德奇”②。道光十九年（1839）修渡碑《万载流芳》记有“我瑶光有渡舡焉”③。瑶光《姚氏族谱》亦有“营生于摇光”④ 的记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苗光”之名发生变化可追溯至乾隆五十七年，即该年所立的《万古碑记》。到嘉庆六、七年（1801、1802）时，我们可以从清水江文书中确定“苗光”已更名为“瑶光”，并为民间所接受。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光绪《黎平府志》所载，咸丰二年，胡林翼更名说与事实不符，《锦屏县志》里雍正时由黎平知府张广泗更名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均与清水江文书及其他文献所载历史信息不符。“苗光”更名当在乾嘉之际，其更名缘由也不仅仅是为了照顾民族感情，还有其他几种可能，但官方史志里却刻意强调其目的为“新安苗光九寨”，公牍文字“不得仍称苗光”。其用意何在？值得深思。

三 “音转字变”、民族融合与乡村地名之流变

通过对“苗铗”“苗光”书写历史的梳理，我们对其流变情况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并纠正了光绪《黎平府志》的错误记载，这一结论亦将有助于相关历史问题的进一步探讨。⑤ 但就本文而言还有一些问题或疑惑值得继续探究。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各个地方的地名文化异常多样、复杂，民族地区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及中央政府对边疆开拓与巩固的重视，乡村地名的流变还是呈现出一定规律或特点的，笔者称之为“音转字变”与民族融合。⑥

其一，“音转字变”与乡村地名书写用字的雅化。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小范围内一般通行方言，民族地区一般通行民族语言，地名书写时往往会发生“音转字变”，而没有民族文字的尤甚。在吉林省通化县有一处“虎马岭”的地名，原为满语地名“红马岭”，埋汰之意，但却被汉族人“音转字变”为“虎马岭”⑦，甚至还编出一段传说故事。安徽歙县亦有“石鸡—石际”“猪形—朱形”“苦竹—古祝”“后村—浩村”“后山湾—浩川”“项山—翰山”“瓦村—斡

① 河口乡瑶光村村民委员会编：《瑶光志》（内部资料），第 246—247 页。

② 河口乡瑶光村村民委员会编：《瑶光志》（内部资料），第 243—244 页。

③ 河口乡瑶光村村民委员会编：《瑶光志》（内部资料），第 250—252 页。

④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 160 页。

⑤ 关于“苗铗”“苗光”的流变情况，我国第二次地名普查仍沿用旧说。瑶光：“古名苗光，以居住苗族得名。清雍正时，黎平知府张广泗到此巡抚，以星座将苗光改名瑶光。得名后沿用至今。”韶霭：“该自然寨旧称‘苗铗’清代中期，一游学行迹至此，以为‘苗铗’一名欠雅。有一天清晨登上寨后高处，见阳光初照，霞彩绚丽，薄雾韶绕，村落一派祥和，不禁脱口而出红日东出尽彩霞，雾需散尽苗人家。真不愧为韶霭也！后人遂将寨名改为韶霭。”详见“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http://dmfw.mca.gov.cn/online/map.html，输入瑶光、韶霭即可查询，2019 年 6 月 13 日。

⑥ 关于地名变迁缘由的探讨学界已有成果，如王振忠之《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3 期。王文以歙县历史地名的改名与更名为例，通过运用地名志、方志、民间文献等材料论述了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如人群、商业、族姓冲突、民间信仰及国家政策等。这些既是历史地名变迁的缘由，也是历史地名变迁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但笔者认为民族地区，历史地名之变迁还当有其地域性、民族性，或者说还应更具体地去分析、补充一些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即本文所述之“音转字变”与民族融合。

⑦ 通化县地名委员会编：《通化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 年，第 398—399 页。

村”等地名因方音相近而被人们雅化，地名书写也随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 历史上“贵州”就是因为当地人“鱼模、脂微”不分而由“矩州”“音转字变”而来。如今，贵阳的“花溪（qi）”，从江的“岜（bia）沙”，云南的“曲（qiu）靖”等地名之民间叫法也与普通话发音有很大区别，我们似乎还能从中看到乡村地名“音转字变”的影子。

本文所述贵州黔东南地区苗侗人民并无本民族文字，民间买卖契约在书写时多用苗、侗语标识，汉字译写，缺乏统一和规范，所以清水江文书中地名书写非常混乱。② 这种混乱无疑会成为研究清水江文书的一大阻碍，但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史实，那就是契约文书中的所谓的地名在苗侗族人民看来取用的只是一个“音”而已，并不是译写出来的汉字，更不是其字面意。如果我们在解读这些地名时仅从字面上下功夫，便会陷入误区，关于这点民族历史学者徐松石在解读两广地名特殊用字时早有论断。③ 从表 1、表 2 的统计中我们也能看到，哪怕是“苗馁”“苗光”早已更名，仍有写其旧名者，甚至 1934 年末红军到达今天的瑶光时仍有“大苗光（瑶光）”④之称。再如契约文书中出现的“加池”也有“伽池”“加什”“佳池”“家池”“嘉池”“假什”“价石”等 22 种写法。⑤

所以，如果过于纠结“苗馁”“苗光”等在契约文书中的混乱写法，可能也会陷入误区，尤其是从“苗光”到“瑶光”的转变。从发音上看可能只是一种自然选择，是“音转字变”的结果。在民间长期的书写过程中，加上官方的作用，人们最终选择了听起来更加美好，更有利于民族团结的“瑶光”。类似的还有，“瑶里”的前称“苗里”，“瑶庄”的前称“苗庄”，“瑶伯”的前称“苗白”，民间亦有“瑶”同“苗”的说法。⑥ 因此，清水江文书等民间文献其实不仅潜藏着大量地名资源，还潜藏着大量地名的苗侗语信息。民间文献中地名书写的混乱也给我们探索该地区民族地名之历史流变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即“音转字变”。

其二，民族融合与乡村地名之变更。民族融合，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事都要考虑到民族感情，地名也不例外。在贵州黔东南地区的地名志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地名的得名缘由与苗侗族有关，甚至直言为了民族融合，照顾苗侗人民之感情把一些所谓的涉民族歧视的地名雅化了。如贵州黎平县之“苗抵”，1956 年因考虑到民族感情而被改为“平抵”⑦，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历史上清水江地区“苗 X”地名非常多，如“苗丢”“苗举”“苗格”“苗吼”“苗庄”“苗里”“苗豆”“苗瑶”⑧ 等，但后来很多已尽可能地被雅化了。

本文论述的“苗馁”“苗光”从字面上讲或有民族歧视的嫌疑。所以民间传说中“苗馁”一名欠雅，清光绪《黎平府志》有“为新安苗光九寨……以后公牍文字改写瑶光，不得仍称苗光”之说。亦有“雍正七年（1729），朝廷招抚茂光 11 寨，在归顺范围内，苗民设‘土司’自

① 参见王振忠：《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3 期。

② 参见杨庭硕、朱晴晴：《清水江林契中所见汉字译写苗语地名的解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

③ 参见覃乃昌：《徐松石“地名考证法”及其对民族学的贡献》，《广西民族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④ 费侃如编著：《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东方出版中心，2006 年，第 63—64 页。

⑤ 参见李鹏飞：《清水江文书之地名学价值探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 年第 4 期。

⑥ 参见锦屏县人民政府编：《贵州省锦屏县地名志》，第 186、193、237 页。

⑦ 参见黎平县人民政府编：《贵州省黎平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 年，第 334 页；亦可参见李鹏飞：《清水江文书之地名学价值探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 年第 4 期。

⑧ 欧潮泉、姜大谦：《侗族文化辞典》，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年，第 186 页。

治，为夸大同化成效，改‘茂光’为‘苗光’，取意苗族全部汉化”；“咸丰十一年（1861），为消除地名遗留的歧视，‘苗光’更名‘瑶光’”① 等说法。暂且不论这种说法的史料依据何在，仅从字里行间就能感觉到，“苗馁”“苗光”地名应是带有民族歧视嫌疑的，且可能被当作民族歧视典型一再放大。如前文所述，“苗馁”“苗光”之更名除胡林翼所言“为新安苗光九寨”外，其实还是有其他几种可能的，但我们都过多的注意或强调民族融合的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几种可能性的存在，而这种可能性哪怕存在，也被泛民族歧视这一误区湮没了。

反过来看，如果“苗光”这一地名有民族歧视意义的话，为什么那么多年过去了，人们仍在契约文书中沿用旧名，为什么 1934 年红军经过今“瑶光”时在日记中仍记为“大苗光（瑶光）”。这里面其实就可能陷入了一个泛民族歧视的误区，殊不知，我们所谓的具有民族歧视意味的地名在苗侗人民看来并非如此。如前文所言，苗侗人民取其音，汉族人民取其意。取其音者，“苗光”为“dliangbseib”，不管是写作“苗光”还是“瑶光”并无区别。取其意者，“苗光”有民族歧视嫌疑，“瑶光”反而没有，所以才改其名曰有利于民族融合。所以“苗里”“苗白”“苗庄”等“苗 X”地名之更改，亦有所谓的照顾民族感情之意，民族融合成了这类地名变更的重要因素。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照顾民族感情的同时也夸大了民族问题的脆弱性，陷入了泛民族歧视的误区。

结　语

综上所述，历史上，乡村地名之流变是一个复杂且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很多时候苦于找不到史料，无法深入。清水江文书等民间文献从某种程度上讲即是若干乡村地名的书写历史，真实地反映了历史时期一个个地名是如何被普通百姓鲜活地书写的，也因此保留了若干地名历史流变的细节，甚至是苗侗地名的读音，而这并未引起学者重视，今后亦是可以进一步挖掘与研究的地方。

通过文献互证，我们可以确定“苗馁”“苗光”的雅化与胡林翼无关，其更名时间亦非咸丰年间，或在乾嘉之际。方志等官方材料中关于“苗馁”“苗光”雅化的书写反映了当权者所强调的民族融合，但其实是对所谓的涉民族歧视地名的一种误读，应该被加以纠正而不是继续以讹传讹，甚至被放大。“苗馁”“苗光”的雅化，尤其是“苗光”等类似乡村地名的雅化或与“音转字变”有关，亦有民族融合的推动，这类乡村地名之历史流变在清水江地区不在少数，其他民族地区亦当有之。

历史上，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开发初期的“苗疆”，乡村地名之变更有着强烈的泛民族歧视色彩，有过度强调民族融合的嫌疑。本文所论述之“苗馁”“苗光”虽为两个乡村小地名，但从前文相关史料的梳理、考证中我们有理由相信“音转字变”可能是探索民族地区乡村地名变更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其间或存在着民族融合，但切记不要陷入泛民族歧视的误区。可以肯定的是，“音转字变”与民族融合也是我国其他民族地区乡村地名历史流变的重要因素，值得深思。只是在最新推出的“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中有些谬误并没有被更正，甚至仍在沿用，而这恰印证了区域小地名之研究很有必要，且还有很大空间。

（作者单位：凯里学院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陈晓毅：《儒教乎？儒家乎？——苗疆“堂祭三献礼”的人类学研究》，夏志前、陈晓毅、马建钊、李筱文：《多维视界中的宗教》，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32—133 页。